

中国最早木棉织物的地望研究

冯志浩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上海, 200031)

摘要:针对中国最早木棉织物出现时间和产地的问题,基于《尚书·禹贡》中“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的记载,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和纺织品文物考古研究法,得到中国最早的木棉织物产地在虞夏时期福建的结论。研究表明:①《尚书·禹贡》中的“岛夷卉服”应为“鸟夷卉服”,“鸟夷”之地则为中国最早木棉织物的产地;②由于《尚书·禹贡》对“鸟夷”之地为扬州的限定,排除台湾、海南等当时并未在中国范畴的地区;③结合清人段玉裁对“鸟夷”之地的三种可能,排除“鸟夷”之地在中原东北的可能,将其限定在福建境内。

关键词:木棉;织物;地望;尚书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2095-4131-(2019)01-0010-06

The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Earliest Cotton Fabric in China

FENG Zhi-hao

(Shanghai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of Cultural Relics,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Daoyi Huifu, Juefei Zhibei” in *The Book of History*,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earliest cotton fabric in China was in today’s Fu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Yuxia period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rchaeology of textile relics. The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Daoyi Huifu” in *The Book of History* should be “Niaoyi Huifu”, and “Niaoyi” was the producing area of the earliest cotton fabric in China, and that the places that were not in China at that time such as today’s Taiwan or Hainan should be excluded because “Niaoyi” was limited to today’s Yangzhou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History*, and that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 possible places of “Niaoyi” advocated by Duan Yucai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ossibility that “Niaoyi” was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Central Plains was excluded and it was limited to today’s Fujian.

Key words: cotton; fabric; geographic location; *The Book of History*

元明两代关于黄道婆的记载,如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张萱的《疑耀》、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方以智的《通雅》等,都提到黄道婆用木棉所织成的布料,在当时名为“吉贝”。“吉

贝”原意就是木棉,方以智即云:“吉贝,即劫贝,木棉树也。”经过革新的“吉贝”制作工艺,是由黄道婆从海南崖州学习来的。根据陶宗仪的说法,松江府乌泥泾人虽早已获得木棉种子

收稿日期:2018-03-13;修回日期:2018-05-05

通信作者:冯志浩,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文博馆员

并耕作,但“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直至元代初年“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另据明代正德年间编纂的《松江府志》,“木棉,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今沿海高乡多植之”,而且《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和元代王祜的《农书》中也都提到当时江南广泛种植木棉。故而是松江府种植木棉在先,黄道婆传授工艺在后,这一点在目前的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关于木棉的种植,其实闽广一带早已有之,如三国魏人孟康注《汉书》就已提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既然木棉至晚在三国时期的福建附近就有种植,那么其最初究竟是起源于本地,抑或从别处移植而来的呢?《尚书·禹贡》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之语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最早木棉织物产地望研究的线索,笔者认为,通过对“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相关文献与纺织品考古的分析可以得到中国最早木棉织物产地究竟在何地的课题。

1 中国最早的木棉织物“厥篚织贝”

《尚书·禹贡》中“扬州”条下有“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的记载,但一直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直到宋代蔡沈开始才将木棉和织贝联系起来,他在为《禹贡》撰写集传时说:“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明代的丘浚又加以阐释,这位出生于海南的学者,模仿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撰写了一部内容相关国策研究的《大学衍义补》,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在“木棉”条下征引该书:“按:自古中国布缕之征,惟丝、枲二者而已,今世则又加以木棉焉。……考之《禹贡》扬州‘岛夷卉服’注,以为吉贝则虞时已有之。岛夷时或以充贡,中国未有也。”因此,丘浚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吉贝”就已经作为贡品了,这就是所谓的“厥篚织贝”。

关于“织贝”,《十三经注疏》用伪孔安国传“织,细纴。贝,水物”,将“织”和“贝”视作两种物品,其中的“贝”解释成贝壳一类生物,这种

说法很有问题。按照《尚书·禹贡》的体例,其他各州置于筐中的织文、縠丝、玄纁组、纁纁等都属于纺织品,如果将扬州的“贝”直接认作是水生动物的贝壳,实在是望文生义。清人王先谦在《尚书孔传参正》中引王鸣盛云:“伪传以织贝为二物,然经但曰织,安知其为细纴?贝果水物,不当入筐,传说非。”“织贝”毫无疑问是一种织物。唐代孔颖达《正义》在释读伪孔传的同时,还引用汉代经学家郑玄的注,“贝,锦名。《诗》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凡为织者,先染其丝,乃织之则文成矣。《礼记》曰:士不衣织。”这种说法与伪孔传不同,有一定的道理。清人孙星衍即赞同此说:“以贝为贝锦者,为实筐之物,且与织连文,知非水贝。”(《尚书今古文注疏》)

笔者认为,“织贝”应该就是《诗经·巷伯》毛传所谓的“文如余泉余蚺之贝文”的织物,而蔡沈和丘浚将“织贝”解释成南方特有的木棉,解决了历代《尚书》注疏中的一个疑难问题。近来不少纺织史论著在讨论先秦纺织品时,都引用“厥篚织贝”,并指出此织贝古人认为是织成贝纹的棉布^[1]。因此,充分说明先秦时期,古中国的扬州地区的岛夷就开始织造、使用木棉织物。

2 中国最早的木棉织物织造者“岛夷”

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织贝”,即木棉织物,早在先秦时期就在“岛夷”中出现。那么这个所谓的“岛夷”,究竟是如何传播木棉的呢?王祜在他的《农书·谷谱十》中说:“其(木棉)种本海南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丘浚也说:“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他们都认为木棉是从外国传入的。近来陈江^[2]、何忠汉^[3]、刘兴林^[4-5]诸位学者都持此说,他们更提出木棉最初可能是由印度传播到中国。

2.1 “岛夷”的写法导致中国最早木棉织物产地的误解

各种中国木棉起源的说法都避不开《尚书·禹贡》“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中“岛夷”的释读。关于“岛夷”，自古以来一直有着争议。《尚书·禹贡》“扬州”条下的“岛夷卉服”和前文“冀州”条下的“岛夷皮服”这两处“岛夷”，伪孔安国传都认为是住岛上的居民，即“居岛之夷”。他说：“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南海岛夷，草服葛越”。由于唐代十三经注疏《尚书》选用孔传，因此“岛夷说”成为了通行的解释。学者们据此寻找《禹贡》所划出的扬州界域内与书中记载情况相吻合的沿岸岛屿，常见有认为日本说，浙江舟山说，琉球、吕宋说，台湾说和海南说等^[6]，犹以后二说最盛。

2.2 “岛夷”的正名是解决中国最早木棉织物产地的关键

《尚书·禹贡》中“岛夷”的所在之地的地望是解决中国最早木棉织物产地的关键，然而，“岛夷”的说法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岛夷”与“鸟夷”之争。因此，解决中国最早木棉织物产地的首要任务是对“岛夷”与“鸟夷”的确定，继而才能确实其地望。

2.2.1 汉代及唐初并无“岛夷”之说

事实上，所谓的“岛夷卉服”，应当是“鸟夷卉服”。孔颖达的《正义》在解释伪孔传的时候，还保存了汉代其他经学家的说法，“郑玄云：鸟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王肃云：鸟夷，东北夷国名也。与孔不同。”汉代马融亦执此说（见陆德明《经典释文》），是汉代经学家都认为这里应当作“鸟夷”，而非如伪孔传解释的“岛夷”。此外，汉代文献《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夏本纪》（今本一作“岛”一作“鸟”）、《汉书·地理志》《说苑·修文》《法言·孝至》等皆作“鸟夷”。而《汉书》颜师古注也谓“此东北之夷，搏取鸟兽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说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鸟夷，东南之夷善捕鸟者

也”；《后汉书·度尚传》“椎髻鸟语之人”，唐代李贤注引《书》曰：“鸟夷卉服”。可见，汉代及唐初的学者大都认为《尚书·禹贡》中穿着“皮服”“卉服”的均当作“鸟夷”。由此可知，有关鸟夷所居住的地方有三种可能：一是东北地区狩猎的少数民族；二是居住在海边穿着鸟形服装的少数民族；三是东南地区善于捕捉鸟类的少数民族。

2.2.2 “岛夷”之说的形成原因

唐代以伪孔传作为《尚书》通行注本以后，学者大多习惯以“岛夷”释读。等到清初阎若璩考证出所谓的《尚书》孔传并非由汉代的孔安国撰写之后，研究《尚书》的学者又对“岛夷”一词重新进行考证。清人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对此剖析地极为清晰，他在“鸟夷皮服”条下指出：“玉裁按：据《正义》孔读鸟为岛之云，是经文作鸟，传易其字。郑、王如字，故云与孔不同也。陆氏《释文》云：鸟，当老反，谓孔传读为岛也。其下文曰：马云：鸟夷，北夷国。谓鸟不易字也。自卫包改经文鸟字为岛，而宋开宝中，又更定尚书释文，两鸟字皆改为岛。以岛夷系之马云，尤失之诬。马未尝作岛也。鸟夷见《大戴礼记》、《五帝本纪》。又按：《夏本纪》、《地理志》皆云‘鸟夷皮服’，然则今文尚书亦作鸟也。今更定经文作鸟，复卫包以前之旧。”他又在“鸟夷卉服”条下指出：“此亦本作鸟，孔读为岛，卫包径改为岛字。《后汉书·度尚传》‘深林远藪，椎髻鸟语之人，至于县下’，李注‘鸟语，谓语音似鸟也。书曰：‘鸟夷卉服。’”玉裁按：此卫包未改《尚书》也。《汉志》‘鸟夷’不误，《本纪》作岛，则浅人用天宝后《尚书》改之也。”

卫包是唐玄宗时的集贤学士。天宝三年，玄宗命卫包将经过隶古定的汉代隶书《尚书》文本，改成唐代通行的楷书。对《尚书》进行这样一次文字改革，是为了能让民众比较方便地阅读，但其间难免存在许多误改之处。到了宋代，李昉、陈鄂又按照卫包所改的《尚书》正文修改《经典释文》。后来，这一套新版本的《尚

书》成为了经籍规范,更有一些人据此把先秦两汉的古籍,如《史记》等中引用《尚书》的内容都进行修改,以求与唐宋本合一。这些举措都对典籍原文造成极大破坏,《尚书》中的“鸟夷”也由此变成了“岛夷”。清代研究今文尚书最著名的大家皮锡瑞同意段玉裁的说法,并认为汉代今文《尚书》也写作“鸟夷”。因此,两汉无论古文、今文《尚书》,都只有“鸟夷”而无“岛夷”的说法。后世学者不察,致使纷纷寻找近海的岛屿,以求合乎“岛夷”之说。

2.3 “鸟夷”之地的地望应为福建

众所周知,《尚书·禹贡》中的扬州疆界大致相当于今淮河以南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江西的部分地区,日本和海南并不属于这一区域。由于“鸟夷卉服”中的“鸟夷”,并不局限于岛屿的居民,因此“鸟夷”可能包括扬州境内各地的居民。正如颜师古所言,“鸟夷”有三种可能,即东北地区狩猎的民族、居住在海边服饰像鸟类的民族、东南地区善于捕捉鸟类的民族。笔者认为,“鸟夷”之地的地望应为福建,理由如下:①“鸟夷卉服”中的鸟夷为东北地区狩猎民族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扬州的范围并不包括中原的东北地区;②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地方志方面看,除福建外,其他地区有关木棉的记载均是在宋代之后,显然,福建为“鸟夷”之地的可能性最大;③福建既位于中原的东南,又有漫长的海岸线,同时符合“鸟夷”可能是“居住在海边服饰像鸟类的民族”“东南地区善于捕捉鸟类的民族”两种可能;④福建的方言体系很复杂,有福州话、闽北方言建瓯话、闽南话、客家话等,其中闽南话确实非常像“鸟语”一样清脆,在古代有由于语调的因素被称为“鸟夷”的可能。综上所述,笔者大胆推测“鸟夷”之地的地望为福建的可能性最大。

3 木棉织物在中国出现的实证分析

虽然《尚书·禹贡》中有相关木棉的记载,但学术界对其成书时间一直未能得到确定的

年代,“鸟夷卉服”所指的时代并不清楚。因此,笔者认为,还需要从古汉语学和纺织品考古两方面的证据来帮助确定木棉织物在中国出现的年代。

首先,古汉字学证据可将中国木棉织物的出现时间上推至虞夏之际。众所周知,古汉语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期会出现一些特定的语句,在一个已经确定年代的文字载体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采用比照的研究方法来大致辅证没有流传至今古籍中某一段文字创作的时代。笔者发现,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遂公盨,其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与《尚书·禹贡》开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非常相近。并且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如此相近的古汉语的用法。笔者认为,《尚书·禹贡》的成篇时间应与遂公盨中的文字所处的年代相近。据考证,遂公盨属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7]。据此,《尚书·禹贡》成篇年代的下限至少可推定为周孝王、夷王前后,其所述木棉织物的内容亦可上推于虞夏之交。因此,笔者大胆推测,木棉织物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上限为虞夏之交,下限为西周中期后段。

其次,纺织品考古证据至少证明木棉织物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证据一:张秉权先生曾在小屯殷虚出土的龟甲上发现若干黏附的纺织品碎片^[8],虽不能确定是否为棉纺织品,但可推断这或许是当时包裹龟甲的,其作用与填充“筐”的“织贝”作用相似,这同《尚书·禹贡》的记载是一致的。证据二: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船棺也出土了一些已炭化了的纺织品碎块,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分析鉴定,分别确定为大麻、苧麻、丝绸和棉布。其中的一小块青灰色棉布,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棉布之一,其原料系多年生灌木型木棉,棉纤维与浙江兰溪南宋高氏墓出土的棉毯及今海南岛所产木棉接近^[9]。其实,中国古代曾利用过的棉纤维概括起来有两大类,一类是棉属植物一年生草棉和多年生树棉;另一类是名为“木棉”的落

叶乔木攀枝花,被古人混同于多年生树棉^[10]。

综上所述,古文献中对南方其他地区利用棉花的最早记载都在两汉以降,而根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对武夷山船棺木质进行碳14的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 $3,445 \pm 150$ 年,相当于商代^[10],这与小屯殷虚的时代是相当的,与《尚书·禹贡》所记录的年代可能也较为接近。笔者认为,先秦时期的古扬州界域内,如福建等地区肯定已出现了木棉。至于一些学者认为的“吉贝”在战国时自印度传到海南,随后直至宋代才进入南方地区,这种说法不太可信。

4 结语

通过对《尚书·禹贡》“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相关的历史文献与中国棉纺织品文物考古简报和综合分析的可知:①由于初唐之前,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并没有“岛夷”之说,因此,“岛夷”之说有误,进而推测出木棉传入中国的南路,即由印度支那——海南——大陆的观点有待商榷;②“岛夷卉服”原为“鸟夷卉服”,“岛夷”之说是由唐玄宗时期的卫包重新修订《尚书》时所误;③《尚书·禹贡》中扬州的范围包括今淮河以南广大地区,基于段玉裁对“鸟夷”之地的三种推测,结合各地地方志对木棉的相关记载,可以断定“鸟夷”之地的地望应为福建境内。经过对以上三点结论进行引发,笔者认为,福建一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木棉,并出现棉纺织工艺。

参考文献:

- [1]陈文华. 农业考古[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64.
CHEN Wen-hua.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64.
- [2]陈江.“岛夷卉服”和古代海南黎族的纺织文化[J]. 广西民族研究,1991(3):95-98.
CHEN Jiang. “Daoyi Huiifu, Juefei Zhibei” and Li Nationality’s textile culture in ancient Hainan [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1991(3):95-98.
- [3]何忠汉,陈江.“吉贝”、“劫贝”的北浸与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的历史渊源和传播路线 [J]. 东南文化, 1994(1):130-134.
HE Zhong-han, CHEN Jiang. Jibei and Jiebei spreading into the North and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nd dissemination routes of southward spreading system of the early Buddhist statues [J]. Southeastern Culture, 1994(1):130-134.
- [4]刘兴林.《尚书·禹贡》“织贝”考[J]. 江海学刊,2005(4):125-131.
LIU Xing -lin. Research on Zhibei in *The Book of History* [J].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05(4): 125-131.
- [5]刘兴林. 论“织贝”出海南[J]. 学术研究,2005(5):145-146.
LIU Xing -lin. Zhibei out of Hainan [J]. Academic Research, 2005 (5): 145-146.
- [6]日本说以《禹贡锥指》的作者胡渭为代表;浙江舟山说见《定海厅志》引元《吴莱甫甬东山水古迹记》;琉球、吕宋说见杨守敬《历代地理沿革图说》;台湾说见清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一,屈万里先生的《尚书今注今译》、周维衍先生的《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也持此说;海南说如前文提到的陈江、刘兴林等先生的研究。
Japan theory is represented by Hu Yu, the author of *Yugong Zhuizhi*; Zh ejiang Zhoushan theory can be seen in *Record of Dinghai Hall* referring to *Wu Lai’s Record of the Landscape and Historic Sites of Yongdong*; Ryukyu and Luzon theory can be seen in *Yang Shoujing’s History of Geography*; Taiwan theory can be seen in *Yu Wenyi’s Record of Taiwan Prefecture* (volume one), *Mr. Qu Wanli’s Annotation of The Book of History* and *Mr. Zhou Weiyang’s Several Issue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1978, issue 10); Hainan theory can be seen in the research of Mr. Chen Jiang and Liu Xinglin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article.
- [7]李学勤. 遂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N].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01-23.
LI Xue-qin. Zhugong Xu and the legend of King Yu

- tamed the flood [N].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01-23.
- [8]张秉权.中国古代的棉织品[A].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1: 203-233.
- ZHANG Bing-quan. Cotton fabric in ancient China[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Academia Sinica.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Academia Sinica (52nd)[C].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Academia Sinica, 1981: 203-233.
- [9]林钊,吴裕孙,林忠干,等.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0(6):12-20.
- LIN Zhao, WU Yusun, LIN Zhonggan, et al. Briefing on clearing the tomb of Baiyan Cliff in Wuyi Mountain, Chong'an, Fujian Province [J]. Cultural Relics, 1980(6): 12-20.
- [10]赵承泽.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46.
- ZHAO Cheng-z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extile Volum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3: 146.

(责任编辑:李强)